

HENANSHENG GAODENG XUEXIAO
XINGSHI YU ZHENGCE KE
TONGBIANJIAOCAI 2006.8



薛庆超 著

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统编教材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壮举 伟大精神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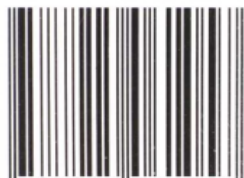
宣传大政方针 关注时事热点

专题性教育性 知识性可读性

教育教学必备 青年学生必读

责任编辑 李自强
责任校对 王保健
封面设计 李健强
版式设计 胡颖君

ISBN 7-215-06105-1



9 787215 061057 >

ISBN7-215-06105-1

定价：1.50 元

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统编教材

历史壮举 伟大精神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

薛庆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壮举 伟大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薛庆超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10
(形势与政策)

ISBN 7-215-06105-1

I. 历… II. 薛…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 - 纪念文集 IV. K26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514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

字数 24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 元

2006 年 9 月国内外时事政治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 9月1日至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从今年起在全国农村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综合改革的新阶段。

台湾“倒扁”静坐开始 9月9日,台湾“百万人反贪腐运动”静坐正式展开,运动总指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带领成千上万民众高喊口号,要求陈水扁辞职下台。

2006 中国科协年会举行 9月16日,2006中国科协年会在京开幕。本届年会围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题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 9月10日,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为主题的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开幕式。温家宝在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加深亚欧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的讲话。

联大连续第 14 次拒绝涉台提案 9月13日,第61届联大总务委员会自1993年以来第14次拒绝将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台海和平”两提案列入联大议程。

泰国发生军事政变 9月19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军方宣布撤销宪法法院,废除现行宪法,并宣布解散看守内阁。泰国审计总长乍鲁万·迈达加9月28日晚间宣布,前陆军总司令素拉育·朱拉暖将出任泰国临时政府总理。

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新首相 9月26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在举行的日本临时国会上当选为日本第九十任、第五十七位首相,并成为首位二战以后出生的日本首相。

(曹景富辑)

教学目的与要求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长征。长征不仅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通过本专题学习,大学生要了解长征的重要历史地位,懂得长征精神的内涵以及长征精神是在怎样的环境和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要明白,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的今天,长征精神对于我们有哪些重要启示,并永远成为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 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地位
- 长征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首先到达陕甘。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长征。随后，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西北，于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至此，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从此，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全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怒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遭到失利。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

存亡考验的危机关头,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一带进军,以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由此拉开长征序幕。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连续突破敌军数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于11月底到达湘黔边界。在不到两个月的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受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这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听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不顾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到湘西堵截红一方面军的客观形势,坚持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如果按照李德的意见办,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有全部覆灭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长期受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排斥的毛泽东在中央负责人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分析了客观形势,批驳了李德的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成。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通道突然改向贵州方向进军,使蒋介石妄图在通道以北“围歼”红一方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及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由于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否定了秦邦宪、李德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层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

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得以参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决策,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时,在进军方向问题上再次发生争论。秦邦宪、李德提出红一方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上,多数同志仍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专门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取消了李德以“军事顾问”身份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以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的错误的、不正常做法,把军事指挥权重新收归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胜利发展和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下惨痛失利的事实,沉重地教育了中央领导机关中部分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同志。长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部分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并抛弃“左”倾教条主义的过程。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怀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首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进行了亲切交谈,列举过去成功的经验,对“左”倾教条主义提出批评。王稼祥后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毅然同“左”倾教条主义决裂,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

同时,毛泽东还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谈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问题。张闻天以后回忆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

作,均由以李德、博古领导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毛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毛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王稼祥和张闻天的转变,是党和红军要求改变“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要求尽快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反映。这表明,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际上起到了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作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比较统一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1935年1月2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乌江,7日,攻取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举行。

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于各种客观因素,如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仍然在坚持错误立场,竭力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解。

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作副报告,即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指出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李德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并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极为重要,他的这种态度具有

深刻的思想基础。周恩来以后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就批评军事路线……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不一样。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作了长篇发言。他将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针对秦邦宪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尖锐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推行的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在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的进攻中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左”倾教条主义者和李德成为众矢之的。

此前，张闻天（即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秦邦宪、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慷慨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尖锐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就是以后毛泽东提起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一票”的由来。

对于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遵义会议是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

“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周恩来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与会的多数人的支持。绝大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换领导,赞同毛泽东领导。

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1.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2月初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这时候,一方面,由于遵义会议已经批判了秦邦宪所犯的错误,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秦邦宪已经不能再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继续行使领导职责;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随时会遇到许多亟须解决的军事、政治问题,迫切要求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去研究、处理和决策。同时,遵义会议上中央决定的新的方针也需要及时向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负责同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传达、贯彻和落实。这样,变换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张闻天就是遵义会议确定的取代秦邦宪在中共中央负总负责的具体人选。长征前,张闻天就开始批评“左”倾教条主义,

同秦邦宪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长征中,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人进行了坚决斗争。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由于张闻天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按照遵义会议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中央“负总的责任”。2月8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总结;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严峻任务;要求红军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实现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同时,中共中央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电告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军委和上海临时中央局。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在遵义战役中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 000人、缴枪2 000多枝的胜利。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为了便于毛泽东更好地行使作战指挥权,中共中央第二次进入遵义以后,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按照红军制度,政治委员为党代表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具有最后决定权,所以对前敌政治委员亦称为前敌总指挥。通过这一任命,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

3月10日,因红一军团负责人向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地名,即今贵州省金沙县县城),张闻天随即在鸭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当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如果硬打,损失了部队不值得。所以,毛泽东力主不打。但与会的其他同志求战心切,坚决主张打这一仗。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历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遂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不谙军事,便根据会议上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决定。当天晚上,毛泽东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考虑到红军长途行军,千里转战,已是疲惫之师,更缺少打硬仗的重武器,只宜打运动战,在运动中寻找敌之弱点消灭敌人,而不宜攻坚打硬仗,使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半夜里又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深谈,让周恩来把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缓发,还是再想一想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早上,再次开会研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时,毛泽东的意见为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重新作出决定,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

经过这场争论,毛泽东感到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争论太多必然贻误战机,军事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临机决断,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指挥作战。于是,建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在苟坝附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长征中,军事问题是中共中央面临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军事问题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长征的胜败,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权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是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以后,又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标志着遵义

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最后完成,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形成和团结统一。

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数座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攻取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西、甘肃、山西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坚持在大别山地区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193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由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从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多次与敌军激战。特别是在南阳地区

方城县独树镇,遭到数倍敌军的包围。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前途命运的千钧一发、生死存亡之际,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亲自挥舞大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共产党员以一当十、前仆后继,全军指战员奋勇冲杀、力克强敌,终于突破敌军拦阻,进入伏牛山区。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挺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全军发展到4 000余人。

1935年7月,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主动西征北上,控制西(安)兰(州)大道达半月之久,以后因敌军重兵逼近,红二十五军北上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15日,全军3 400余人到达陕西延川永坪,这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南方红军部队。然后,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增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达奠定了坚实基础。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部队,一路上斩关夺隘,备尝艰辛,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入陕甘起到了战略先导作用,功不可没。

(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参加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领导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等武装起义,开辟了广阔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约3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地区多次赢得大规模战役、战斗的胜利。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向西转移。1933年2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在战斗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5月,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连同机关及地方武装约10万人,开始长征。

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

月，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共同北上。这时，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地区。

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率部南下以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公然通过“决议”，另立“中央”。“决议”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此时，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以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行动中同敌军多次作战，虽然消灭了许多敌人，但是也遭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936年2月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于4月上旬抵达藏族区域甘孜、炉霍地区。因伤亡很大，只剩下4万余人，减员过半。

这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陕甘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最新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前景，红四方面军要与中央会合的强烈要求和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还有，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明确表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态度，以及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所有这些都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形成空前强大的政治压力。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不仅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力量。在中共中央坚定有力的争取下，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8月到达甘肃南部。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一部）33 000余人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